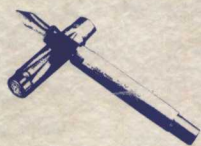


文坛亦江湖

大师们的 相重与相轻

汪兆骞 著



文坛亦江湖

大师们的 相重与相轻

汪兆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 汪兆骞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43-4119-5

I. ①文… II. ①汪… III. ①知识分子—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4005号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作 者 汪兆骞
责任编辑 张 霆 姚冬霞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119-5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急先锋”与“乘势英雄”——胡适与鲁迅 / 001

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

当年四海说陈胡——胡适与陈独秀 / 013

陈、胡因《新青年》而聚首，时代成就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时事造就了他们成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的英雄主角。随着《新青年》的思想分裂，又促成他们新的历史空间，各展宏图大业，为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史的演化，重写新的篇章。

“带着兰花草”与《青春》相约——胡适与李达 / 027

二十七岁的李大钊与二十六岁的胡适，因缘萍水，亦非偶然。历史让他们代表着一代知识精英与前进的思想跨入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他们二人的相遇、相交，一个自由主义者与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者结为一生的朋友，并一直联合作战，充满戏剧性，也充满悖论。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 / 039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语出《诗经·小雅·大东》。我国古代把早晨出现在东方天空之星叫启明，将黄昏出现在西天的星称长庚。实际上是同一颗星即金星。但不懂天文的周老太却说两星一早一晚升于天空，永不相见。以此暗喻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命中注定。这或是宿命。

“看风格，要看这些地方”——刘文典与胡适 / 053

刘文典敢于顶撞政坛新贵蒋介石，斥责他专横跋扈，被蒋投入监狱，胡适为营救他全力以赴。胡适看中的，正是刘文典身上那股精神自由刚正不阿的个性。胡适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旅程，使他渴望入世，渴望对话，渴望开诚布公，渴望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选择个人的人生方向，渴望文人学者有自由精神的个性。刘文典是他的知音之一，所以他们成为朋友。

梦非梦，花非花——废名与周作人 / 065

一直关心恩师周作人的废名，见周作人出狱后生活困顿，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都怕惹祸上身的政治背景下，为老师热心奔走，并在北大为老师募捐。得知寒冬里“苦雨斋”寒冷难耐，废名想办法，为老师弄到一车煤炭，送到“苦雨斋”。

战士和书生——闻一多与梁实秋 / 077

如果说闻一多是位“民主政治的战士”，梁实秋该算是具有自由灵魂的书生。激进的战士和自由主义的书生，志趣不同，却是一生的好友。在西南联大，闻一多从楼上走下来，变得很激进革命的时候，梁实秋为朋友担心，劝他不要在公共场所太过激烈。闻一多遇害，梁实秋保存了闻一多给他写的36封信，还有闻一多遇害时的报纸。梁实秋去台湾时，又将这些已发黄的珍贵资料带在身边，一直锁在箱子里。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徐懋庸与鲁迅 / 091

从左联成立前后，周扬等非常不尊重鲁迅，有事很少向鲁迅请教，甚或以党的领导自居，约鲁迅谈话，并无中生有地造胡风的谣，说他是南京方面的人，理由仅仅是听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所云。对此，鲁迅以“四条汉子”称之。而尤令鲁迅所不容的是，他们提出“国防文学”竟连个招呼都不打。如今又写信批评自己，鲁迅自然气恼，便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诞生。

讷讷向人锋敛芒——朱自清与叶圣陶 / 103

叶圣陶总是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出现在朱自清面前，这每每让朱自清羡慕，叶家人待叶圣陶太好了，他的起居衣着都由家人管，故叶圣陶虽长于朱自清，却像孩子般单纯天真。到杭州学校后，分给他们每人一间宿舍。叶圣陶提出他那间房做二人的卧室，朱自清那间改成书房，这样可以共寝共读，各据一桌，备课写作，常常相伴。

爱我园林想落晖——林语堂与鲁迅、胡适、赛珍珠 / 115

赛珍珠真正算是“中国通”。她熟识胡适，知道周氏兄弟，对林语堂更有好感，是因为她读过林语堂许多闲适小品，其充满睿智又幽默的风格，令她着迷。她知道林博士是位通晓中国国学，熟谙四书五经又在美、法、德留过学获得多个博士学位的饱学之士。最后选中林语堂完成她夙愿的另一理由，是她觉得林语堂幽默活泼的语言，特别适合美国人的阅读口味。

小脚与西服——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 / 127

徐志摩作为诗人，他的诗风清新平和，诗性潇洒、温柔和精致。对他深爱的女人，他是热烈、忘情、执着、痴迷的，如对林徽因，对陆小曼；但对于他那家庭包办的婚姻，对妻子张幼仪是冷酷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这是他灵魂的两面。

漫将毁誉付东风——张爱玲与苏青 / 143

张爱玲和苏青的小说创作自然有高下文野之分，但其在艺术风格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她们的代表作，多是对女性和情感生活有深入的参悟，而且各自都有着独特的生存体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小团圆》，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都具有自传色彩，甚或说是文学化的自传。苏青的小说几乎就是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

“姑且试试也可以”——冯雪峰与鲁迅 / 155

鲁迅与冯雪峰亲密无间，二人常秉烛夜谈，许广平见证了这些场景，“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儿。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

“跳出四条汉子”——周扬与鲁迅 / 173

1936年8月，病中的鲁迅接到徐懋庸充满挑战的信后，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此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给鲁迅补充修改而成，进一步说明鲁迅的见解。从这篇文中，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作为极度厌恶。痛斥徐懋庸，意在批评周扬。

“刑天”遭遇“棍子”——胡风与周扬 / 183

对胡风悲剧责任很大的周扬，在“文革”中也切切实实地尝到被整肃的滋味。苦难过去后，历史安排了胡风与周扬的劫后重逢。那时二人都已老态龙钟，周扬先开口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

“武将军”惜败“文化沙皇”——丁玲与周扬 / 199

周扬与丁玲，是延安的名人。他们都愿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周扬始终是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中间，而丁玲则更愿意以文学家的身份与人们交往。周扬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力欲决定他处心积虑地觊觎权力，手段自然是取悦上司。后逐步完全政治化，成为文化官僚。而丁玲太多的文人习性，有时就难免忘乎所以地表现出来。

“正直的人”，“毒辣的鬼”——冯雪峰与周扬 / 217

1975年10月，赋闲在家的周扬去看望病重的冯雪峰。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

无法远避的政治风尘——郭沫若与沈从文 / 231

20世纪40年代初，沈从文在《文坛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文中，表述了不赞同作家从政的观点，认为作家应站在大众立场，一旦从政，难免“趋时讨功”，“凑趣帮闲”，忘却了文学的道义。郭沫若便在《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一文中，指出沈从文在抗战中提出“反对作家从政，就是反对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

也是“一块砖头”——丁玲与沈从文 / 245

1949年6月8日丁玲奉调从沈阳入京筹备并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她以革命作家的身份，住进了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一座小楼里，住房豪华别致，地上铺花砖，楼梯有地毯，卫生间里有热水。沈从文曾小心翼翼地到此拜访老朋友，他感到这里比起她与胡也频早年居住的北大宿舍，已有天壤之别。

一生不愿提鲁迅——钱锺书与杨绛 / 255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并未提及给杨荫榆定性为“恶虐婆”

的鲁迅，其行文风格如钱锺书，“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水水，成了一条‘落水狗’”。其深意尽显其间，比那杀气腾腾的文字，更有杀伤力。

马樱花发半城红——俞平伯与何其芳 / 273

1970年，俞平伯和何其芳在河南息县东岳集干校劳动。年已七旬的俞平伯在菜班种菜，五十八岁的何其芳在猪圈喂猪。俞平伯还曾帮何其芳赶那些到处乱窜的猪，累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彼此相视而笑。俞平伯心里明白，何其芳的所谓“罪状”，重用“反动文人”俞平伯，便是其一。

双鬓终应老是非——吴祖光与吕恩、新风霞 / 285

1949年，吴祖光回到北京，收入微薄，难以为继，吕恩抵押了他们的房产，将所得全部给了吴祖光。为了支持吴祖光拍戏采景，她还买了德国原装相机送给他，据说相机贵抵一辆汽车。吴祖光与新风霞喜结连理，吕恩送了厚礼和祝福。婚姻不存在了，吕恩与吴家情分不断，关系一直很好。

去年残叶太分明——汪曾祺与沈从文、老舍 / 299

1935年1月5日，《人间世》杂志在征询广大读者、作家“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活动中，老舍应征回答，列举的几本书中，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位居第一。1952年，沈从文在北京博物院工作，填写“博物院工作人员交待社会关系表”时，沈从文把老舍的名字填入“作家中熟悉的”栏中。

“急先锋”与“乘势英雄”

——胡适与鲁迅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旧时代的最后一位终结者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哲学家杜威高徒。1917年受北京大学之邀归国任教授，参与《新青年》的编辑。最早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领导一代知识青年与前进的思想界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先后出版《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巨著，其在哲学、文学、文学研究诸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者。

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积极宣传抗战。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再回北京大学，任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又到台湾，1962年病逝。

鲁迅（1881—1936），思想家，文学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入南京水师学堂、路矿学堂求学。1902年赴日本留学，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爱好拜伦、裴多菲等人诗作，从此致力于文学工作，借以改变国民精神。后受革命影响，参加光复会。1909年归国后，

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等校任教。1911年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1926年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讲师、教授。1918年5月，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为中国白话小说奠定基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1927年，他放弃进化论思想，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进行坚决斗争，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民主革命作出杰出贡献。其一生作品很多。辑录逸书、校订典籍，颇有成绩，有三十三卷《鲁迅大全集》。

匆匆百年过去，胡适和鲁迅早已殁谢，但其流风余韵犹系纸墨之间，每每追念，感慨系之。关于他们的种种纷争，也意味深长。

1917年伊始，陈独秀将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编发在他主办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作为策应，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二人共同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

陈独秀对胡适向旧文化“发难的口号”（郑振铎语）《文学改良刍议》，评价甚高，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陈独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文学革命论》）

对此，胡适则很自谦，也很客观地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并说如果没有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坚决态度，“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五十年

来中国文学》)。

胡陈二位，虚怀若谷，毫无虚伪的客套，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胸襟已超出一介书生的高尚，而具有“人与文化”的历史内容。

鲁迅虽不是首举义旗者，却是遵“文化革命”、“白话文运动先驱者”的命令而创作文学的乘势英雄。正是有了鲁迅白话文的文学实践，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才从此焕然一新。

鲁迅对胡适和陈独秀是充满敬意的。他声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因文言而僵死，中国人处于既聋且哑的文化状态下，是“无声的中国”，而有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才使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他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于白话文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表明了倾尽全力与胡适等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三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造就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批文化巨人。这些巨人的文化人格丰富复杂，文化性格多姿多彩。研究并挖掘这些文化巨人们的精神遗产，关乎国民人格建设，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弘扬，也关乎“立人”之本。

从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来看，尽管有个性、见识、气度的差异，但对新文化运动是齐心协力、精诚团结、坚决彻底的。是向旧文化攻击的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可是，时至今日，仍有些人（包括一些学者），未读懂或虽懂胡适与鲁迅者，却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思想资源、文化价值上，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简约化割裂，每每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抉择。特别是对胡适、鲁迅二人，进行平行比较，有着各种说法：什么胡适是渐行的自由主义者，鲁迅是激进的革命作家；胡适侧重制度建设，鲁迅重在国民批判；胡适作自由之梦，鲁迅发绝望之叹。甚或有人比喻说，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胡适养花，鲁迅种刺……不一而足。更有人简单地把“五四”以来的

新文化运动称为“胡文化”与“鲁文化”云云，皆有“类非而是，类是而非”之嫌。这其间的个人好恶，让“是非乱其真”了。

前几天读了一篇关于评论胡适、鲁迅的文章，其中就有以骂与不骂来界定两位文化巨人的宏论。如引用鲁迅“我的杂感常不免骂人”（《意表之外》），对比胡适“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无益于事”（胡适致钱玄同信）。在“骂”与“不骂”上做文章，强说硬说，世事岂能洞明！

中国人常常喜欢对历史人物做二元对立的选择，忽略了文化人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化性格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二人相辅而行又相辅相成，共同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生动局面，并构筑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

但胡适与鲁迅的新与旧、中与西、精神与物质、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这些贯穿于中国现代化之命题，将继续困扰我们。呜呼，胡适、鲁迅其价值意义殊非言语能简单道断，其生命底蕴真谛亦非常人所可尽道，这是文化的悲剧，还是我们的悲剧……

（一）

胡适与鲁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发起时，走到一起，并肩战斗，有过战友的情谊。

鲁迅应该感谢胡适，正是胡适与陈独秀共同开创了白话文运动，才成就了鲁迅成为乘时势的英雄。

早在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就翻译出版了一本《域外小说集》。胡适读后称赞其为“古文学末期”的“最高的作品”。但命运弄人，《域外小说集》十年之内竟仅卖出二十本，平均一年销两本。究其因，此小说集采用的是文言文译文，而且是硬译。与同时期林纾用一手漂亮桐城古文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的畅销，形成鲜明的对照。

鲁迅在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承认，他写白话小说，是为了响应“文学革命”的潮流，其步调是与“前驱者”胡适、陈独秀一致的。鲁迅称自己是遵“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的。他高度评价说，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使“无声的中国”，成为“有声的中国”，将一个“濒临死境”的文化“复活”过来。

乘白话文运动时势，鲁迅创作的《呐喊》《彷徨》等，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正是白话文使周树人成了鲁迅。

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前后，鲁迅在北京南城的山会邑馆的补树书屋，苦苦地寻觅。常以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是在同乡蔡元培的举荐下，一同来到北京，做了教育部的金事。教育部派系林立，等级森严。鲁迅消沉，迷上佛经，玩起古董。但这位穿长衫，鼻下留着浓黑口髭的先生，那双清澄深邃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威严的浩然之气。

其实，消沉是对时局的一种无声反抗，并非沉沦。他说最高的轻蔑就是无言，他钻进故纸堆，几乎耗尽精力校勘《嵇康集》，还辑校了《志林》等五部书和谢承的《后汉书》，并四处搜集资料，打算开始《会稽禹庙窆石考》的写作。

面对体质和精神都已僵化的国民，他何尝不想站出来发点议论！

机会来自《新青年》和胡适、陈独秀共同鼓吹的新文化、新思潮。

1918年岁首，《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陆续加入的撰稿同人有已与胡适相识的周树人、周作人、张慰慈、刘半农等。在1月4日，周树人《致许寿裳》信中，就有“《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由此可见周树人已对《新青年》予以关注了。但真正支持《新青年》的举动，是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交《新青年》，并于1918年5月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署名是鲁迅。

《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对“人吃人”的封建社会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刊出后，在北京大学争相传阅。鲁迅的名字也为人们所熟知。胡适给予《狂人日记》的评价甚高。

鲁迅支持胡适、陈独秀办《新青年》，不仅给它撰稿，时不时提些建议，与胡适的关系处理得也很融洽。1918年11月4日，鲁迅在《渡河与引路》（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唐俟）一文中提出，“《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对“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胡适欣然接受并改进。

1920年《新青年》在上海，由陈独秀几乎办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时，胡适劝告陈独秀，办《新青年》应仍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浓。对此，胡适提出三条办法：一、办一个哲学文学期刊；二、《新青年》从九卷起移回北京编辑，宣言不再谈政治；三、《新青年》停办。就在陈独秀和胡适发生分歧时，鲁迅站在了胡适一